

# 容闳现代化思想发展述论

沈 潜

(常熟理工学院 人文系, 江苏 常熟 215500)

〔摘要〕近代中国知名社会活动家容闳,一生历经了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整个历史过程。他以“西学东渐”为职志,为挽救民族危亡和谋求社会进步,积极投身于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应时乘势地紧贴了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进程。借助其自传体回忆录《西学东渐记》有助于认识容闳现代化思想生成和演进的历程。

〔关键词〕容闳;西学东渐;现代化思想

〔中图分类号〕D0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733(2008)06-0064-04

被誉为中国近代“留学生之父”的容闳,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颇具典型意义的重要人物。《西学东渐记》作为他生前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反映了在“古今中西大交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努力为寻找民族出路、探求救国方略而交织矛盾、困惑和变异的知识分子人生选择。借以《西学东渐记》为视角,有助于认识容闳现代化思想生成和演进的历程。容闳生活的时代,正当传统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在西方列强的胁迫下跨入近代社会门槛的历史转型时期。综其现代化思想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逐步递进的历史阶段。

一是由西学发蒙到爱国维新思想的生成期:

1828—1854

1828年出生于广东香山的容闳,本自贫寒农家。但因地处沿海开埠通商的特殊环境,使他沾溉了欧风美雨的最先影响,较早地接受了西学教育。7岁时,他被父亲送往澳门的西塾学堂读书。正如他在回忆父母当年的做法时推测:“惟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为在旧塾读书,而父母独命予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至于予后来所成之事业,似为时世所趋,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sup>〔1〕</sup>(P42)13岁时容闳进入马礼逊学校学习,1847年随校长勃朗到美国去留学,先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中学就读,1850年考上耶鲁大学。1854年从耶鲁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留学生。为筹得生活费用,他在校内打零工,既

负责为同学们提供餐饮服务,又在图书馆兼任管理员。赖以师友的帮助,更有秉持了一份自强不息的惊人毅力,半工半读中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在美前后度过的8年生活,容闳广泛而系统地涉猎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更亲眼目睹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科技的成就。逐步酝酿并抱定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sup>〔1〕</sup>(P62)的宏愿。在校期间,对比中西方社会现实的强烈反差,容闳深感故土家园的落后和黑暗,自觉意识到了肩负的历史重任。他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能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以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sup>〔1〕</sup>(P61)因此,在容闳心中,“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sup>〔1〕</sup>(P62)的观念一直耿耿于怀。临近大学毕业前一年,他“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sup>〔1〕</sup>(P62)为今后努力的方向作了筹谋。这就是他在自传中所表述的:“予意以为,予之一身受此文明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sup>〔1〕</sup>(P62)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青少年,能像自己一样出国留学,接受西方先进教育,掌握西方科学技术,从而以西学改造中学,使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富强的国家。可以说,容闳远赴重洋的留学期间,已初步形成了致力于西学东渐的教育理想。

〔收稿日期〕2008-06-15

〔作者简介〕沈潜(1965—)男,江苏昆山人,江苏常熟理工学院人文系副教授。

## 二是为实现教育救国理想而历经曲折的磨难期：1855—1895

大学毕业后，容闳怀着学以致用的心愿毅然回国，开始为自己的教育计划能付诸实践而努力。但是，从广州到香港到上海，归国后不到一年已三迁其业，也曾一度以经商为业，严酷的现实使他无以施展救国理想，徒为衣食奔走的他难免了茫茫然不知所措的困惑。容闳对此深有所感：“若长此见异思迁，则所希望之事业，或且如幻灯泡影，终无所成。又非不自觉予之希望过奢，志向过高，颇难见诸实行也。第念吾人竟存于世界，必有一定之希望，方能造成真实之事业。……一旦遇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子学问，即多获一分效果，此岂为一人利益计，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予于所事，屡次中辍，岂好为变迁哉？”<sup>[1]</sup>（P74）于是，容闳审时度势，把目光投向了当时各种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上。

早在留学期间，容闳就对国内太平军起事极度关注。回国后不久，目睹两广总督叶名琛镇压粤中会党暴动，造成血流成渠、尸首遍地的惨状，使他“既表同情于太平军，乃几欲起而为之回应”<sup>[1]</sup>（P70）。当时，太平天国因天京变乱而由盛转衰，容闳在香港结识的好友洪仁玕，已被洪秀全加封干王，总理朝政。因此，抱着对太平军的同情和理解，1860年容闳由上海去定都天京（今南京）的太平天国辖区实地考察。寄望于太平天国革命而跃跃欲试。容闳随即向洪仁玕提出了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和海军学校、建设善良政府、创立银行制度、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及设立各种实业学校等建议。<sup>[1]</sup>（P94）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而其中尤以建立新式教育为基本，试图借此模仿资本主义进行改革。但在一个半月的考察之后，容闳深感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sup>[1]</sup>（P95），只得怅然而去。事后他回忆：“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藉手，可以为中国福也。不图此行结果，毫无所得。曩之对于太平军颇抱积极希望，庶几此新政府者能除旧布新，至是顿悟其全不足恃。”<sup>[1]</sup>（P99—100）

借以太平军实现报国心愿的最初尝试受挫后，容闳仍坚执初志，寻找着新的出路。稍后，际会于洋务运动的倏然兴起，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少数地方实力派开明官僚，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开始了引进西技西学的洋务事业。容闳正是他们视为办理洋务的合适人选。1863年经友人李善兰的推荐，容闳应曾国藩之招赴安庆，从此入幕赞襄，并与洋务派建立了长达近22年之久的因缘。

在先，容闳被委为出洋委员，赴美采购机器，筹建江南制造局；后又出任江苏行政署译员，驻节上海，倡议设立兵工学校以储备人才；同时译述了美国人哥尔顿的《地文学》和派森的《契约论》等著作；1873年在家乡出资办学，创立“容氏甄贤学校”；1874年在沪发起创办

《汇报》，竭力鼓吹西学；不久赴美转往秘鲁，调查当地华工实况；1875年冬被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钦差副公使；并协助规划上海机器织布局。可见，来自他此间积极引进外国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科学技术，热情倡导办报办学等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努力开展外交活动捍卫民族利益。特别是1868年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条陈并请转呈总理衙门上奏，容闳以组建轮船公司、开矿筑路和限制教会权利为陪衬，重点提出了自己“魂梦不忘之教育计划”<sup>[1]</sup>（P105）。1871年经曾国藩、李鸿章专折会奏，奉旨允行。翌年，容闳受命担任留美学生事务所副监督，负责有关事宜。每年分派30人，分4批完成。派遣幼童出洋留学的计划终于付诸实施。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原定15年学成回国的期限，到1881年被全部遣送回国。容闳依靠某些当朝权贵实现教育计划的用心，就此半途而废。

凭实而论，从容闳参与洋务事业的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来看，他与洋务派的宗旨迥然有别，前者以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强国为出发点，后者则从维护封建统治而立。容闳与洋务派的关系既是互相利用又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说此前因为容闳“西学东渐”的主张与洋务派“师夷长技”思想在谋求自强问题上达成共识而得以联手将事，那么，随着洋务运动的渐次开展，思想宗旨的不同势必导致两者之间的最终分离。明乎此，就不难理解容闳与洋务派在留学生事务所的裁撤问题上存在的矛盾冲突，不难理解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半途而废的思想根源，也同样不难理解当全部留学生奉命提前撤回后，容闳愤然退出洋务运动的自觉选择。如他事后追忆：“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sup>[1]</sup>（P144—145）可见，留学生计划的夭折，既给了容闳沉重的打击，同时也让容闳对中国的改革有了更进层面的感悟与认识。

此后寓居美国的十多年，正可视作他处于思想困境中伺机再图振起的蛰伏时期。

## 三是从主张维新到倾向革命的思想蜕变期：1896—1912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远在大洋彼岸的容闳更加感愤交加。他在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的同时，接连致函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蔡锡勇，提出向英国借款、购置铁舰、雇佣洋兵等议项，呼吁坚持对日作战。1895年容闳奉命回国，在与张之洞会面时认为：中国不欲富强则欲，苟其欲之，则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决不能恢复其原有之荣誉。<sup>[1]</sup>（P150）为此建议政府应延聘客卿改革新政，即聘请外国人为中国政府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顾问，并选拔年轻有为的中国学生“置于顾问之下，以资练习。”容闳相信：“如是行之数年，则中国行政

各机关，不难依欧西之成规，从新组织也。”<sup>[11]</sup>（P150）但张之洞对此未置可否。

此后两年里，容闳又向清政府建议设立国家银行和修筑全国铁路。为此，他先在上海翻译了有关美国银行的一些法令法规，而后参照中国国情加以增改，草拟了一份筹办国家银行计划条陈，方案在户部侍郎张荫桓和户部尚书翁同龢的赞同下上奏批准，却最终被官僚买办盛宣怀从中阻挠而失败。至于1897年提出修筑天津至镇江的铁路计划，虽有光绪帝的允准，但最后也在反对势力的夹击下未能如愿。这时，容闳感叹：“予之种种政策，既皆无效。于是予救助中国之心，遂亦至此而止矣。”<sup>[11]</sup>（P154）

伴随19世纪末维新派的应时而起，标志着近代中国思想舞台上的主角转换，由此拉开了近代民族救亡运动的新帷幕。在此情势下，容闳走上了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起谋求变法自强复兴中国的新径，从而折入了一个新的思想层次。在他提出设银行、筑铁路的维新计划均遭冷遇后，容闳决定留居北京，通过支持维新派来实现他救国的宿愿。此间，他与维新志士频频来往，互为推引，相启共发，所在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sup>[11]</sup>（P156）容闳以他的爱国主张和计划，对康、梁等维新派领袖多有影响。证诸康有为上奏光绪帝有关统筹大局的改革方案，诸如筹款筑路、购铁甲船、练兵、设立新式学堂、创办银行等主张，与容闳所持想法多有相似之处；康有为甚至还推荐由容闳赴美联系筹款等事务。由于顽固派发动政变，风动一时的变法运动成为瞬息即逝的“百日维新”，容闳的救国理想再度化为泡影。迫于顽固派追捕的危急情势，他不得不托迹于上海租界，不久转往香港。此后的事实表明，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并没有使容闳心灰意懒，反而促使他更加积极地谋求联合各派政治力量共同改革中国，继续在19世纪末多变的政治风雨中奔走呐喊。

转入世纪交替的1900年，容闳及时调整自己，继续寻求与新的社会变革力量的协助与合作，开始了自身思想的新旧转型时期。从此间成立的中国国会的宗旨和宣言中，不难看出容闳思想路径的变化。由当时上海维新派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发起的中国国会，主要宗旨是：一、保全中国自主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的权利；三、请光绪皇帝复辟。身为会长的容闳在为国会起草的英文对外宣言中对此明确表述：“决定不承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声张乐于全世界，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于之人民，藉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举。”<sup>[12]</sup>（P37）这个既不承认清政府统治，又要光绪帝复辟的政治立场，实质上表达了旨在推翻慈禧专制统治后建立一个排除民族压迫，独立自主的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愿望。可以说，与同时期不少政治人物一样，

容闳主张排满勤王并举的矛盾行为选择，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思想实际。但是应当注意，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不久，面对世纪初急剧嬗递的历史风潮，痛切于中国社会岌岌乎不可终日的现实境地，结合自己屡遭挫败的救国实践，容闳逐步认清了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对于腐败的清政府表示了越来越强烈的不满。由此，在随后的几年里，与坚持保皇立场的康梁分道扬镳，进而转向赞同和支援孙中山反清革命、创建民国的事业，成为他晚年思想的重要转折。

事实上，始自参与中国国会和自立军起义，直到1908年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容闳曾一度竭力坚持联合各派力量共同推翻清政府的主张。基此认识，他一方面与康梁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则与革命派多有交往，寻求携手合作的途径。应该说，这种试图联合各派改革力量的想法，正与孙中山最初的意向不谋而合，以致两人未曾谋面前的1900年8月，孙中山就在日本表示：“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sup>[13]</sup>（P198）并认为“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sup>[13]</sup>（P198）可见他们联合的意图在于以改革中国为共同目标。

时隔不久，容闳在登轮赴日途中与孙中山邂逅相遇，两人一路纵论天下大事，畅谈救国理想，使他更趋于同情、支持革命。但无可否认，此时容闳正介乎于康有为、孙中山两派之间周旋，看似矛盾的背后，真切地表明了他希望把主张改革或革命的所有力量联合起来共创反清救国大业的良苦用心。到他决定离开香港赴美定居前夕与来访青年就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一番谈话，指出：“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并特别称誉孙中山“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予助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心志。”勉励年轻人帮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更满怀信心地认为：“东亚主人，终在中国。”<sup>[14]</sup>（P114—115）可见他思想上已明显倾向革命。

随后，伴着革命风潮如狂飙卷地高涨的形势，尤其是1905—1907年革命派同改良派展开的大论战，促使爱国的人们冲破君主立宪的思想束缚，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身处异域的容闳，对腐败的清政府表示了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对坚持保皇立场的康有为也多有不满，认为他“并非一安全可靠之维新人物”<sup>[15]</sup>（P332），从此毅然与康梁决裂，站到了孙中山革命派的一边。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容闳先是在美努力为孙中山进行宣传，要求美国人民协助孙中山实现其革命理想和推翻清政府的计划；又向孙中山介绍美国友人军事学家荷马李、西部财界人士布恩，促成他们共同商议筹集巨款、训练军官、发动武装起义、筹组临时政府等计划，以期革命

早日成功。虽然不切实际,但所有这一切无不说明了他对革命派寄予的厚望和对祖国前途的深切关注。

1911年武昌首义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年至耄耋的容闳随即多次寄函国内友人,表达了对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无限敬意和衷心祝贺,同时阐明他对共和国安定民生和培养人才等问题的见解。至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诞生,孙中山随后致函于他,盛赞他“谋覆满清之专制而建伟大之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之幸福”的革命业绩,表示“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环宇,加以才智学识,达练过人,用敢备极欢迎。”<sup>[6]</sup>(P143-144)热诚邀请他重返祖国共商建国大计。无奈84岁高龄的容闳已卧病不起。不久,在弥留之际殷殷嘱咐他的儿子容觐彤、容觐槐“弃所营业,回助祖国”<sup>[7]</sup>之后,是年4月走完了他艰难坎坷的人生旅程。

可见,从积极参与康、梁等维新变法活动,到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容闳的思想最终实现了从维新向革命的再一次飞跃。

应当说,作为中国近代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容闳一生所走的道路颇具典型意义。

阅读《西学东渐记》分明能揣摸容闳身处急遽的政治潮流中焦虑、忧患的心魂,从他先后尝试与太平军、洋务派、维新派等的合作意向和行动,委实不是简单地投机附会,随缘而遇。每一次转折性的人生抉择,无不起因于他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密切关注,起因于他对当时急遽兴替的政治力量的认真观察与比较。由上述容闳现代化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来看,贯穿始终的是他矢志不渝的救国心愿。以往,论者对容闳与太平天国关系上从最初同情到失望而别的举动不无指斥,认为他对农民革命缺乏起码的了解,与农民革命格格不入。结合《西学东渐记》中对太平军的观感,不难看出容闳的离开太平天国,是他从中西文化交流和比较的角度对太平天国深入认识的结果。有论者通过比较容闳和洪仁玕的近代化方案及其遭遇,指出在曾国藩与其它洋务大员们展开自强运动之前,容闳与洪仁玕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变革方案,并寄情于农民领袖洪秀全,但正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粉碎了他们的近代化之梦,这充分说明了农民政治与知识分子及其近代化理想的复杂关系,揭示了农民

政治并不能为近代型中国知识分子提供广阔的政治舞台,农民政治也不能将中国导向近代化的国家。事实表明,“洪仁玕以《资治新篇》贡献于农民政治的祭坛,得到的是其政治理想的实际幻灭与自身回归于传统政治文化的结局;容闳在对天国失望之后,奔向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显著开创意义的人物——曾国藩身上,使其抱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sup>[8]</sup>(P54-68)至于容闳转而投入曾国藩幕府并从事洋务事业,应当看作是他为实现现代化理想而继续努力的行为选择。留意他此间显形跃姿的种种践行,无不折射出试图借助较为开明的当朝权贵来改革中国政治、力求祖国富强的苦心孤旨。有见于此,当洋务派勃勃于“中体西用”的窠臼而却步不前时,容闳又异趣而去,并在新的时势驱使下开始了与新的社会变革力量的主动结合,以创办国家银行和修筑全国铁路的主张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及至革命浪潮明起暗涌,愈演愈烈,他先是倡导改革派的协作,终在失败与挫折中基于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深刻反省,把爱国与革命结合起来,实现了一生中最光辉的思想转变。

## 参 考 文 献

- [1]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走向世界丛书[G](第1辑). 长沙:岳麓书社, 1985.
- [2] 杜迈之. 自立会史料集[G]. 长沙:岳麓书社, 1983.
- [3]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G](第1卷).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 [4] 刘成禺. 世载堂杂忆[M]. 北京:中华书局, 1960.
- [5] 吴相湘. 容闳欣见民国肇建. 民国百人传[M](第1册).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1.
- [6] 孙中山全集[G](第2卷).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 [7] 容联芳. 容闳传. 容氏谱牒[G](卷15). 山卡世堂铅印本, 1929.
- [8] 王继平. 知识分子与农民政治:容闳和洪仁玕的近代化方案及其遭遇[J]. 曾国藩学刊(湘潭大学内刊) 1995(1).

(责任编辑:刘建民)

## On the development of Rong Hong's modernized thought

SHEN Qian

(Humanistic Department, Changshou College of Technology, Changshou 215500, China)

Abstract: Rong Hong, who was the famous social activist in modern China, in whose life, he experienced the whole historical process from Opium War to the Revolution of 1911. He aimed at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Culture", to save the nation from danger and promote society development. H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changeable historical stage, closely follow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odern society. It can help us to know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ong Hong's modernized thought by his autobiographical memoir, the Record of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Culture.

Key words: Rong Hong;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Culture; modernized thought